

赵
树
理
研
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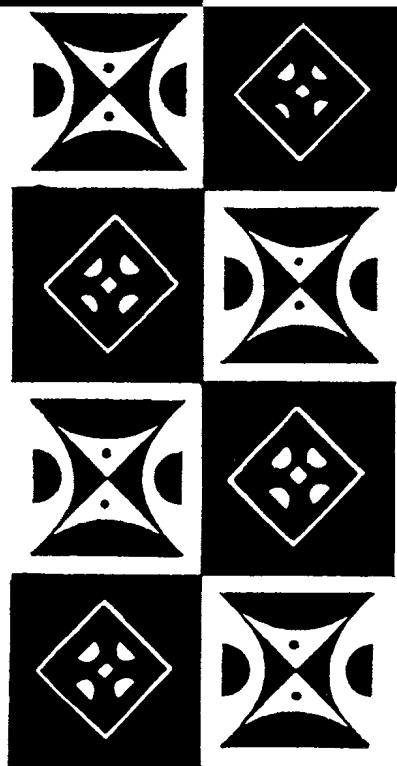
黄
修
己

2062/144

版
社

赵 树 理 研 究

黄 修 己 著



赵树理研究

黄修己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0092

1030092 山西人民出版社



赵树理研究

黄修己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6 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 册

*

书号: 10088·937 定价: 1.30 元

导 言

本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新星，这就是当时被人亲热地称为“农民作家”、“农村作家”的赵树理。自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著名的作品问世后，他便引起了国内广大读者的注意，也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评论、研究赵树理的创作，始终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且不说直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已达到何等的水平，单就数量而言，已发表、出版的各种专著、论文、评介等，在现代作家研究领域中，大概是仅次于鲁迅等被称为“巨人”的少数几个作家而位居前列。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对这样一位具有独特风格，对新文学的发展有着独创性贡献的作家，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不，直到现在，对赵树理的认识也还是并不一致的。深入地理解、评价这样一位作家，仍然是有待努力的一件事情。

这里，我们首先简要地回顾一下赵树理研究的历程。

在四十年代初，当赵树理呈献出他的成名作时，对他这种标明“通俗故事”的小说，看法就是不很一致的。就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也有人认为这毕竟算不上是真正的艺术品，只是供文化水平很低的、缺乏艺术鉴赏力的人阅读的。待到他的作品出乎人们意料地受到广大工农兵和干部的热烈欢迎，实践证明了赵树理

所创造的小说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个四十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热情的赞颂。老一辈作家如郭沫若、茅盾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度评价赵树理的作品。在解放区，也有周扬等的比较系统的分析和一些领导同志的极力推荐。一个新人的作品得到如此隆重的褒奖和热心的扶植，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这可以说是对赵树理评论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的末尾尽管也发生过对《邪不压正》评价的分歧，不过并没有对赞美赵树理的主旋律发生多大干扰。

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出发，肯定赵树理的作品能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深刻描写农村阶级关系，配合了当前的政治斗争。《李有才板话》和《地板》，这两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是相当悬殊的，但以同一个理论来衡量，它们都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教育作用，因而得到了相近的评价。其次，是从艺术上肯定赵树理塑造了血肉生动的农民形象，熟练地运用农民口语，学习民间文学传统，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等等。作为对一个新作家的认识，这些已经是很不错了。后来的赵树理研究，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树理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新的成就。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正式建立，对赵树理的评论除了继承上一时期的成果，对具体作品作更细致的分析、探讨外，还注意到赵树理的史的地位的评价。这时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和有关论赵树理的文章，几乎都把他作为一九四二年后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方针的典范，把他的创作作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最早实绩。对赵树理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可是，这时期“左”

的思潮也在不断地发展着。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赵树理的意见，都可以看到“左”的影响。赵树理虽然安然地渡过了最初几次文艺战线的批判运动，到底有一天棍子也打到他的头上来了。《“锻炼锻炼”》挨了第一棒。由此并且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文学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数年后，《十里店》在演出后也引起了争论。否定的理由大致上同于否定《“锻炼锻炼”》的那一些：“难道我们的农村生活就是这样的吗？”都认为赵树理把社会主义农村描写得太阴暗了。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集中表现在一九六二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上。这次会议曾给予赵树理对待生活和创作的态度以高度的评价，肯定他反映了农村生活中的困难和曲折，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化。有位作家还称道赵树理是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不过这两种评价较量的结果是后者的失败。“左”风愈炽，赵树理的处境愈加不妙。问题渐渐变成对赵树理创作生死存亡的审定；对他的研究虽向纵深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无法再进行下去。这是评论赵树理的第二个时期。

一九六四年以后，对赵树理的评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开始批判所谓写“中间人物”论。大连会议受到严厉批评，赵树理成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标兵而遭牵连。他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于次年回到山西工作。接着是十年大动乱的来临，四十年代以来对赵树理的评价被全盘否定。赵树理从忠实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下子变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成了“大毒草”，被统统打翻在地。最后，连他的生命也惨遭扼杀，一九七〇年他含冤去世。这是历史越出了常轨的时期，充满着血腥气味的诬陷、诅咒代替了真正的文艺批评，所谓“大批判”不过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手

段。真正的文艺研究、文艺评论中断了，只是为了叙述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我们才把这时称为赵树理评论的第三时期，或者就叫中断期吧！

粉碎“四人帮”后，进入了赵树理评论的第四个时期。到目前为止，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段落。前一段落即重新认识、重新评价赵树理的段落。这时的评论主要是拨乱反正，为赵树理恢复名誉。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得到了肯定。特别是在文艺界为了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肯定“问题小说”的重要功用时，赵树理的创作也被举为这方面的成功的实例。人们的认识显然地比过去深刻了，从赵树理为代表的流派（俗称“山药蛋”派）的升沉起伏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了评论者的注意。后一段落即近年来对赵树理研究的深入发展的段落。虽然刚刚开始，却已显出了可喜的兆头。成绩最显著的是资料的收集。四卷本的《赵树理文集》出版，第一次较完整地汇集了赵树理的作品。为研究和评论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不久又将有《赵树理文集》的续集出版。赵树理的生平史实，也被大量挖掘出来。他的老同学、老战友和亲属，他的故乡的人们，写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文化大革命”前仅有很简略的赵树理小传、年表，而现在光是相当详尽的年谱就有好几种。《赵树理传》、《赵树理评传》等已经或即将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赵树理研究丛书》已经出了好几种。这种兴旺发达的景象，在赵树理评论史上，是空前的。这个事实极有力地证明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推动文艺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没有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赵树理研究的迅速复甦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特别应该指出，几年来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人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活的认识，对建国以来文学事业状况的认识，都比过去有所深化；因此，在肯定赵树理的文学贡献的同时，他的创作的局限性也较多地被提出来了，开始改变过去作家评论中，要不一片赞歌，要不一概否定的简单化、片面性的现象。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进步。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意见的出现，争论的发生。有的不满足于赵树理的风格，认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流派必须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人们不能老吃焖土豆、炒土豆，现在也该吃吃拔丝土豆了。有人更认为“山药蛋”派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正面临着衰亡的命运。不同见解的出现，说明人们对赵树理的思考深入了。同时，对国外的赵树理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始有一些文章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所有这些，对于推动赵树理研究都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把赵树理研究深入下去，向着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不仅对于赵树理研究，而且对于所有的作家研究，对于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简略地回顾近四十年来的赵树理研究和评论的历史，是为了从中引出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工作。一门学科、一种研究工作，要取得进展，当然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客观环境。不要说象十年动乱那样的时期，就是在“左”的思想泛滥的条件下，赵树理研究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是无法得到顺利发展的。同时，一门学科的发展又与它的队伍的质量有重要关系。研究者自身的才、学、识的水平，无疑将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这主观方面的条件，不可能靠着一朝一夕之功就能创造出来。但是，撇开这些主客观的条件，四十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确实还有一些

问题，对于赵树理研究关系至大，应引起注意。

首先就是要注意克服赵树理研究、评论中的教条主义偏向。这种偏向突出表现在把文艺批评变为一种政治学批评，即从政治学的某一理论出发，去衡量一部作品，以评定其成败优劣。我们知道，赵树理的创作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主要描写他所深刻体验过的晋东南地区农村生活。我们的评论，也应该从生活出发，检验作家反映特定形态生活的真实与深刻的程度，他的艺术形式与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和谐统一的程度等。然而我们有的评论，常常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条条、本本出发。批评有关土改题材的作品，就要求作家应该先告诉读者党的某项政策，其次再告诉另一政策，以为要这样写才好。评论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则根据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理论、政策，要求作家必须写这个写那个，否则就是政策思想不完整。按照这种批评，哪位作家能用形象把某一理论、政策图解清楚，就是最优秀、最高明的了。然而却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甚至干脆取消了艺术创造。正确的理论是从生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既然是概括，其中必已排除了许多特殊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实际生活则较之理论具有具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作家反映现实，往往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性、特殊性、偶然性来反映生活的一般规律。这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特性。无视甚至取消这种特性，必然要严重地损害艺术创造。马列主义理论对于每一个革命作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指导作家观察、认识、分析生活的科学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列主义不能代替创作，我们不能要求作家按照理论去描画生活。可惜，我们过去一些评论恰恰是非常严格地拿着某个政策的图样去套文艺作品，作出这样那样的评价。批评家质问作家“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其实他自己并不懂得生活。这

句质问如改为“难道理论是这样的吗？”倒是更为确切的。如果一个批评家，他既不了解实际生活，又不了解艺术创作的规律，他又怎么能搞好文艺批评呢！？

还要指出，这种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偏向，往往为简单粗暴的打棍子、扣帽子的“批评”铺平了道路。例如从理论出发，来评《“锻炼锻炼”》，则“在大跃进中的今天农村”，小腿疼，吃不饱式的妇女，当然是“极其个别的”。赵树理把这“极其个别的”人物，摆在作品的重要位置上，“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现实吗？难道这就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再从理论上讲，基层干部应是“党的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应是“党的化身”；然而王聚海、杨小四等没一个够得上这种水平，难道“这就是社干部的形象吗？这就是农村现实情况的写照吗？”于是，轻轻一推，便推出了“这样描写社干部和解放了的农村妇女，的确是一种诬蔑！”更进而要追究“作者把它写到纸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接下去就要追查作者的政治动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服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偏向，实是不可忽视的一件事。

顺便还要提一提，由于赵树理创作往往提出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意识地要对现实生活起一点指导作用，过去的评论也往往对他的这个特点、优点给予肯定、褒奖；因而过去从政治作用上评他的作品的，就比较多。加以他追求通俗化，又被有的人误解为浅显、平淡，觉得艺术上没有什么好评的。这些因素结合着便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从政治上和群众观点上评价赵树理之外，便没有更多好说的了。这已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的思路，为使赵树理研究深入下去，也必须克服这种错误观念。

其次，也还要注意在文艺批评中不能过于强调自己主观的趣

味、爱好。赵树理是一个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正因为有了这个“独特”，便不可能为所有的人喜爱，这与“众口难调”的道理是一样的。赵树理的作品既有人酷爱，甚至可以说受到崇拜，但也有人不太喜欢。一般说来在农民中拥有广大的爱好者，而知识分子往往并不怎么欣赏。说是“雅俗共赏”，其实只是说赵树理的作品也可以供“雅”者赏，并不是说“雅”者一定都欣赏。正因为如此，才从《小二黑结婚》开始，对赵树理的评价始终有两种意见。这往往不表现在已发的评论中。因为除了象武断地全盘否定《“锻炼锻炼”》那种文章（毕竟是极少的）之外，凡是著文评赵树理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肯定他。这里指的是实际上，实际上确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在感情上并不爱赵树理的作品。既然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有时也会反映到评论中。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爱之者说好，只要是赵树理写的，没有不好的，篇篇好，句句好，似乎是完美无缺的。这类评论读多了也会使人感到腻味。不爱的人当然可以不说什么，但如果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无法回避对赵树理的评价，也只好说几句，不过在他们心目中，赵树理的地位是不高的。至少认为周扬把他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列为“当代语言大师”，是太抬举了赵树理。这种怀着个人爱好，甚至是偏爱来评论作家作品，便很难做到客观、公允。感情上的隔阂会阻碍人们进入作品，与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交流，从而失去深刻地理解作家创作的机会。有时不但会看不到作家的优点，反而会把优点当做缺点轻易抛掉。偏爱、溺爱则会把缺点也当作宝贝，过份的爱也会阻碍人们的深入思索，而让思想停止在作品的表面上。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的忌讳。在所有的作家研究中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但似乎在赵树理研究中更为突出，因而更应该引起注意。演员在表演中崇奉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的一句名言：“要热爱心目中的艺术，不要热爱心目中的自己。”做评论工作的人，也应该从中得到启示。我们要十分看重作家所创造的成果，而不要过于看重自己的趣味、爱好！

在注意纠正过去的一些偏向的同时，在今天这样有利的时机，为了使赵树理研究真正向纵深发展，还要注意开阔我们的眼界。我们不能孤立地评论赵树理。过去，研究一个作家多是只看这个作家的作品和有关材料，对这位作家之外的情况知之不多。要研究好赵树理，实应了解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不但要了解风格相仿的马烽、西戎等山西作家，还要了解经历、风格、创作道路差异颇大的丁玲、周立波、柳青等。还要了解他之前的鲁迅，了解“乡土文学”，了解“普罗文学”。还要了解他之后的有关作家，从李准到高晓声。当然，除了作家还应知道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要了解“五四”文学革命，了解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更要了解延安文艺整风运动。除了中国的情况，也要知道外国文学情况。中国古代写农民生活的作品（主要是诗歌）还是有的，但大多是作家、诗人表示自己的同情怜悯之心，而没有去塑造农民的典型形象。但外国写农民的作品却比较多，东西欧和俄罗斯文学中，农民生活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少。亚非拉文学中农村题材更占有重要地位。光是已经译成中文的，已很可看。异国异域的作家们是怎样反映他们那个地区的农民生活呢？我们也应该尽量多知道一些。古人也知道“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的道理。只有知道的东西多了，才能领略山外青山天外天的境界，才有比较广阔的眼界。这样，才可能看出赵树理这颗星在整个银河系中的位置，把他放在与时代，与其他作家的相互关系中来考察与论述，在比较中找准他的创作的特点，找出他的独特

的贡献，描出他这颗星的异彩。除此之外，还要了解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艺术等其他部门的知识。不了解中国的抗战史，不了解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不了解晋东南的风光、风俗、人情、方言、地方艺术等等，恐怕也很难深刻地理解赵树理的作品。

这里要说一说，比较文学对于培养世界的眼光是有好处的。我们不仅可以进行国别的比较，也可以拿了比较的方法进行本国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的比较，现代作家互相的比较。这对于扩大眼界，开阔思路，准确地评价作家作品，都会有好处。因而，这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方法。把比较理解为比高低，打擂台，这是对比较方法的歪曲。一个作家成就的高低是客观存在的。比较不仅可以避免在不是这个作家的特点，不属于他的特殊贡献之上花费精力做文章，而且可以把真正是他的独特性的东西更鲜明地突现出来。科学研究要讲实事求是，无原则的捧场和轻率的贬抑，都是不足取的。比较的方法恰恰有助于准确一点论述作家的成就和局限。

最后，还有一个开拓批评路子的问题。直到目前，我们的文艺批评主要还是政治批评和艺术批评两种。一些对于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所达到的思想性深度的分析，大多还是为了判断作品政治的优劣。而艺术批评，则主要从创作论的角度进行的，诸如塑造形象、情节结构、语言等的分析。久而久之，文艺批评无形中有了一种不变的格式——先谈作品反映了什么，再谈反映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等等，然后再讲讲艺术上有什么优缺点。千篇一式，习习相因。赵树理研究自不例外，文章写来写去无非“问题小说”、“劝人文学”、“民族化、群众化”等等，好象很难突破似的。我们承认一个事实，即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在达到

一定的水平后，再要往前迈出那怕是小小的一步，也比开始时要难得多。就象体育运动一样，某个项目的纪录达到一定水平后，再要提高零点一秒或零点一厘米，都是非常不易的，都要付出更多的汗水。但是，另一方面，赵树理研究毕竟远未到顶，还有很多领域等待我们去拓荒，这也是事实。问题是我们的批评路子太窄，现在应该勇敢地去开拓。那怕是那里荆棘遍地、野兽出没，也要敢于踏进去。即使摔了跤、流了血，甚至丧了命，对于志在开辟、探索、创新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四十年中因为历史的原因来不及做的工作，我们今天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下来。

为了开拓，也须要借鉴，借鉴国外文艺批评的一些方法。在西方，有人把二十世纪称为“批评的时代”，各种批评流派层出不穷。尽管其中有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赞同的，有的方法对我们也不适用；但是，研究、考察西方现代文艺批评发展状况，对我们肯定会有所启示，可以吸收的东西可能比现代派的创作要多。上一世纪根据泰纳、圣伯甫的强调环境和作家人格对于文学的作用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批评、传记批评，还有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分析学派，到了本世纪被认为是“传统的批评”。新批评派指责这些批评是“非文学”的，或称之为“外在的批评”，即只重视文学与其外部各种因素的关系。它强调文学自身的研究，也就是只做文学形式的批评。结构主义则反对新批评派只注重作品的个别性分析，而提出对文学作整体性的批评。它们都因为强调研究文学自身的问题，被有的人称为“内在的批评”。前边提到的比较文学则在上世纪末便已发展起来了，它所进行的是文学与文学（他民族、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或者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部门关系的研究。可见它们各有自己的侧重

面，各占据一定的角度。只要我们不是生搬硬套，并且抛弃它们那种狭隘的排他倾向，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它们的长处，则对于开阔视野，扩大批评领域，增添批评的方法，是有帮助的。

本书就是希望为开拓赵树理研究的领域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书中涉及传记批评、社会学批评、发生学批评、审美批评、整体性批评、比较批评等，不必讳言，这是有所借鉴的。笔者认为对外来的方法不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文艺批评各种派别的发生、发展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哲学背景和文学背景的，因此照搬它来分析背景条件完全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是行不通的。我们一定要避免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最没有出息的文学艺术教条主义。重要的是要研究外来的方法，从中得到些启发，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方法。在这个创造中，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名词之前，也不妨使用一些与西方相同、相似的概念，但实际内涵已经是并不完全相同了。我曾经看到一篇比较《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的文章，后来又读到一篇介绍比较文学的文章，说这种把《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比较，根本不是比较文学。这才悟到原来比较文学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就难怪有些青年人戴上一副进口的太阳镜，舍不得把商标撕掉，大概也怕人家说他的眼镜是膺品吧！本书也有一些“商标”，不过先得在此声明，未曾在任何外国政府注册，实在是一些土产品也！至于所用的方法是否科学，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则有待于大家的检验和批评。

用了各种方法分析的是同一个对象，有时难免会有所重叠。不过所要考察的方面是并不一样的。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都可以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深入到作品中去，并发掘出自己独特的发现；每一种方法也都有自己的范畴，不可能是全能的，因

而必有局限。如果把各种方法综合起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分析，摄制出全信息的照片；那么，我们认识一部作品、一位作家，就可能比单一的分析更充分、更详尽，因而也更全面些。另外，某个作品，从甲角度去观察、分析，得到了肯定性的评价；再从乙角度看去，却可能给予否定性的结论。这种状况，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也可能会遇到。我不想为了保持一部著作论点上的统一性，避免因“前后矛盾”而受到诟病，就来设法掩盖由于使用不同方法、立足不同角度所产生的歧异的感受、印象、评价。我觉得不妨保留这种矛盾，说不定这种矛盾就是一些突破口，可以引导我们去深入地思考问题。只要肯于跟踪追击，或者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自然科学家为了检验假设的正确与否，要用各种方法来做实验。一种方法失败了，就换一种。这说明方法虽多，不一定都好。花枪耍得再漂亮，到了战场上却不堪一击，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任何方法是否合理，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推动科学研究，帮助人们认识的发展。一种方法的运用，如能使我们得到许多新的发现，它就应该得到肯定。反之，不能使我们获得新知识，甚至引出错误的认识，那么如果不是这种方法的荒谬，便是运用上的失误。它的生存权就值得怀疑。本书的全部论点和论述方法究竟有没有价值，留待赵树理研究的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检验吧！

DC84/24

目 次

导 言	(1)
第一章 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形象	
——发生学批评	(1)
第一节 生活原型与艺术形象的比较	(2)
第二节 构思过程的分析	(11)
第二章 赵树理小说的本色美	
——审美批评之一	(19)
第一节 纪实性与趣味性的结合	(24)
第二节 平易与蕴藉的统一	(29)
第三节 无技巧的境界	(33)
第三章 赵树理小说欣赏和移象作用	
——审美批评之二	(38)
第一节 形象化的语言	(42)
第二节 写实与写意相融合	(49)
第四章 赵树理创作中的农村社会问题	
——社会学批评之一	(56)
第一节 农村婚姻问题的描写	(58)
第二节 农村家庭问题的描写	(63)
第三节 农村社会结构的描写	(70)